

第 一 章

东 亚 概 况

第 一 节 地 缘

东亚 顾名思义是指亚洲的东部地区 有人称这一地区为“太平洋亚洲”(Pacifcasia), 也有人称这一地区为“小亚太”或“大东亚”, 总之, 这一地区大体上指的是亚洲东部或太平洋东岸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 包括亚洲大陆东部及其半岛和邻近的岛屿, 主要是指中国大陆 日本 朝鲜 韩国 中国的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文莱。这一地区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3$ 经济总产值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1/5$, 面积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1/10$ 。这一地区也大体上是汉字文化圈所及的范围。学者们在论及东亚的发展模式、发展原因和现代化道路等问题时, 一般就是指这一区域。

除了以上国家和地区外, 俄罗斯是否可以划归东亚版图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其远东地区从地理上来讲, 应属东亚, 但俄罗斯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和主要战略利益都在欧洲部分, 所以作为一个国家来说, 它应该是一个欧洲国家。但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从地缘上讲 俄罗斯有 $3/4$ 以上的领土在中亚和东亚 其面积差不多等于 40 个日本 而且拥有丰富的资源。据统计 俄罗

斯资源的 60% 在其亚洲部分。例如木材储量的 65%、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 2/3 在其亚洲部分。随着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发，其经济地位将会与日俱增。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调整了苏联的战略目标，改变了以往把主要立足点只放在欧洲的战略，对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认识和估价，强调苏联不仅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曾一度把注意力放在西方，但很快又转向亚洲，实行东西方并举的“双头鹰”战略。普京上台后基本上实行这一战略。不过，俄国的这种“双头鹰”战略还是对欧洲有所侧重的。俄国一直在东亚仍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拥有强大的太平洋舰队。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东亚大国。它可能比前苏联要弱小，它的政治体系和经济状况目前也比较混乱，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仍具有影响本地区其他大国的安全利益以及决定本地区力量均衡的特征的能力。它的绝对面积，它的资源，它的联结世界几大最强国家的利益的地位，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它成为一个强国的潜力，都让人捉摸不透它对本地区未来秩序的作用是吉是凶。这些因素也保证了所有东亚国家在制定它们的当代对外政策时不可能不考虑俄罗斯。”

蒙古虽然也有一部分处于东亚范围，但大部分领土属中亚，并且由于与东亚多数国家的联系非常有限，因此，人们在谈到东亚时，常常并不把它考虑在内。从这个角度讲，东亚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该地区某些国家本身的经济、政治发展，以及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联系程度等。

① Ross Robert ed, *East Asia In Transition: Towards a New Regional Order*, N. Y. 1995, p. 368.

第二节 文化特色

社会文化是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独具特色的重要因素，我们研究东亚的特点时，不能不注意它的文化。一般来说，东亚存在五大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和印度教文化。有的国家或民族只信奉一种宗教，只有一种文化，而更多的国家和民族同时存在几十种宗教、几种文化。东亚的主体文化是东方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儒家文化。但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化的侵入及其影响不可低估，它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现在是东亚考虑建构一种既具有自己独特内涵又不失现代性本质的东亚文化的时候了。十几个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一直处于儒家文化的辐射范围之内。东南亚的文化最早来源于印度，但“在最近几个世纪中，这一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战略方面与东亚其他地区的联系不断增加。”^①因此，东亚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圈”。实际上除了儒家文化外，还有佛教、道教等其他传统文化因素，不过它们的共性很大，都是中华传统文明的一部分。“这个大文化圈不论在人种、书面文字系统、家族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历史形成的共同性与相关性，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或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圈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②

当然，东亚近几个世纪以来也一直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尤其是近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对东亚有着越来越大的影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第 4 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第 212 页。

响。^①同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统文化正在发生向现代性的转化,东亚人民也不得不考虑不断改变自己传统的思维方式,以适应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节 经济发展特色

除日本和泰国外,东亚国家在 20 世纪前半叶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处于前工业化时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经济结构畸形发展,人民生活相当贫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十几年内,东亚国家陆续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从此,这些国家在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开始了经济起飞。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近 40 年的时间东亚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总体来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创造的记录都快。例如:“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初,工业增长速度很慢,当时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 已是历史性的突破。这种增长也只在英国的某些地区出现过。”到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在西方先进工业国中这一增长率达到 1%—2% 即提高约一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增长率又翻了一番,达到 3%—5% 被称为‘经济奇迹’。但是真正的经济奇迹出现在东亚地区。这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工业化进程中把经济增长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 7%—8% 甚至更高,一般都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年平均增长率一倍以上,这是自工

颜清煌:《19 世纪新马华人社会史》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年第 265—296 页
李路曲:《新加坡现代化之路 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新华出版社 1996 年第 111—130 页、313—315 页。

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全新势头。”

东亚的特色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其经济增长不是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现象，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现象。这一点与欧洲、美洲曾出现的“经济奇迹”在同一时期一般都是发生在一两个国家有很大不同。同时呈现出所谓“雁阵”或“链条式”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扩散的发展阵式。60年代日本利用美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率先实现了高增长，70年代“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香港和韩国）也利用国际市场的这些有利条件迅速发展起来，到80年代又出现了“三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90年代又有中国和越南的腾飞。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等在发展中呈现一种“雁阵”，它们在发展层次和利用国际市场方面都表现出一种从前到后的扩散形式。还有人把它们说成是“整体咬合联动的链条式增长体制”。“它像几个齿轮一样，互相咬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彼此牵动、互相补充的动态经济增长体制。”这一方面反映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态势和影响，另一方面可能说明了东亚各国的一致性、联系性和互补性较强。

第四节 政治特色

由于自己的独特的历史环境，因此东亚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带有本地区鲜明特色的民族运动、政治体制和政治意识。

独具特色的民族运动主要是指由于20世纪中期以前东亚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各国几乎在同一大环境下都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因此（一）各国都是在五六十年代取得民族独立的（二）东亚各国民族运动发生的后发性、外生性和惯性对东亚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文化等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最为深刻的影响莫过于由于东亚各国的民族运动都是在自己的中产阶级还未发展起来，在外部现代化因素输入的刺激下启动的和运作的，这就使得民族运动既不是由中产阶级领导的，也不是依靠中产阶级推动的，而是一种以传统的农村力量为主体的民族运动。所以，其领导层在民族运动胜利后可以不顾及中产阶级的利益，而向传统的农业力量妥协，因而有一种回归传统的趋势。其主要表现就是社会力量的弱小和国家的强大。独具特色的东亚的权威主义体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独具特色的东亚的政治体制就是指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形成的东亚的权威主义政体。这种权威主义从体制特征上来看，与其他地区的权威主义没有多大区别，中央高度集权，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行政主导等。但是，首先，东亚的权威主义是现代与传统相融合的产物，它的现代性较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集权政治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较高级阶段的发展，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其次，它有较高的稳定性，不但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而且持续的时间较长，一般都在三四十年以上，这与拉美的权威主义有很大不同。即使是在近年来的政治转型阶段，它也保持了较稳定的局面。这正是其政治体制的独特性所在。

特殊的政治意识主要是指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式民主”的观点。东亚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在批判西方式民主和西方国家的人权观的同时，提出了亚洲自己的民主观和人权观，强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应有不同的体制和发展

模式。如新加坡的李光耀、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印尼的苏哈托是其典型代表。在其他国家，如泰国、缅甸、越南、老挝，其领导人也多是持这一观点。虽然日本、韩国的新领导人并不支持这种观点，但是，日本的“日本第一”和“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韩国的“大韩民族精神”等，也都是“亚洲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的体现。“亚洲价值观”实际上就是要人们不要以西方的标准来审视“亚洲式民主”，亚洲要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由国家和政治精英主导的民主模式。但是在世纪之交这种特殊的政治意识似乎不是在增强，而是有点衰弱了。

第 二 章

权威主义政治与现代化

作为政治转型的起点，我们有必要对东亚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建立起来的权威主义政体进行探讨。本章从国家政治的层面上比较系统的和概括性的考察了东亚的权威主义及其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具体论及了殖民主义政治与民族权威主义政治的不同，对权威主义政治现代性的判断，东亚权威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及各国的特色等。

第一节 殖民主义政治与民族 权威主义政治的比较

东亚绝大多数国家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独立以前，一直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就政治体制本身的性质而言，殖民政治与日后建立的权威主义政体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国家超越社会的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这两种政体中，政治领域的权力具有专制性，这种权力相对不受法律与民意的约束与制衡，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公民则有相对的自由和自主性，不过殖民主义的时代各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而民族权威主义时代则是以市场经济为主。政治领域与经济、社会生活领域的二元化，是这两种政体既不同于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治也不同于议会民主政治的根本特点。但是在民

族性、合法性和政治运作的度的方面，殖民主义政治与民族权威主义政治之间却存在着某些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虽然两者都对政治权力进行垄断，但是在动员人民追随统治集团参政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殖民主义政治之下，大众的政治参与不受鼓励，他们完全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而在权威主义政体之下，大众在追随的意义上被动员参与体制，分享部分政治权利。原因是殖民统治者与大众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存在着敌视与隔阂，统治者不能作为民族或人民的代表而获得合法性，只能靠对人民的压制和对权力的垄断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对他们来说，只要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就是合法的。在权威主义政体之下，以民族主义相号召不仅完全可以成为统治集团获得合法性的来源，而且，这是动员人民追随统治者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在追随的过程中，一方面现代化获得了极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人民必然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分享政治权利，而统治者也不得不为之。当然，这一时期民众所获得的政治权利往往缺乏自主性，不能构成多元化的动力。“凡是由于现代化的需要而将权力集中于某个单一的、统一的、有等级之分的但又是‘群众性的’政党的国家，都不能成为民主的滋生地。群众参政始终与独裁统治同步前进。”^①因为在现代化的起飞和凯歌行进阶段，要对殖民主义留下的分散的、组织涣散的和惰性仍然较强的传统社会进行改造，需要的是权力的集中，而不是权力的分散。只有把权力集中在现代化的领导人手中，才能击退传统势力，有效地推进现代化的进程。权力分散只会使权力更多地落入传统势力的手中。

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 第 149 页。

第二，统治集团现代化导向的程度不同。虽然一般来说，殖民主义传播的西方观念趋于强化现代性的挑战，但是殖民统治者也极力阻碍民族主义领导获得政治权力。对于现代民族已经形成的国家来说，要想实现现代化的起飞，就非发展民族的商品经济不可；而发展民族的商品经济，则必须先有民族主义领导取得政治统治权。因为只有他们才具有民族性，才能在整个民族范围内为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发展商品经济创造最好的条件。由于有的民族主义领导缺乏现代性，在他们取得政权后可能一度中断现代化进程，但是政治体制迟早会通过内部的权力更替来培育出这种现代性。东亚权威主义的政治领导有的是一开始就具有这种现代性，他们是由从西方留学归国或受到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如新加坡的李光耀、马来西亚的东古·拉赫曼等人；或是与西方有着密切联系的政客，如菲律宾的马科斯就是由于采取亲美态度而在美国的大力协助下上台，韩国的朴正熙、卢泰愚也都是如此；苏哈托也是右翼亲西方路线、主张市场经济的领导人。这些权威主义的领导人一般都了解和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和商品经济。所以，殖民统治者与权威主义领导相比，后者比前者更能顺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

第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不同。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就更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凝聚作用。但意识形态是以文化为底蕴的，它的转变是一个较之现代化的政治进程和社会经济进程更为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外来的文化在短时间内很难与之相适应。欧洲殖民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完全是西方式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东亚大众的政治文化相脱节，因此他们很难利用这种统治工具。而权威主义的统治者则不同，他们本身就是民族的，完全可以用与大众政治文化

相衔接的意识形态来凝聚社会。东亚的权威主义领导利用民族主义和儒家文化来号召民众就是明证。从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东亚权威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更能够引导大众和号召大众，因而也更能适应现代化的进程。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由殖民主义向权威主义的转变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它适应了现代化的进程。正如前述，虽然殖民主义政治在对权力的垄断上与权威主义政治非常相似，但由于它是外来的，因此在很多方面有着局限性，不能发挥民族的权威主义政治可以发挥的许多现代化功能。在完成这种转变之后，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功能就会得到强化。

第二节 权威主义政治的形成

对于传统的东亚社会来说，现代性的挑战是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而开始的，那还是在殖民地时代。从那时起，殖民者就与传统的东亚社会的政治发生了冲突。自 19 世纪开始，就逐步剥夺了当地土著领导的权力，建立了西方殖民者的统治。例如，从 1826 年英国建立海峡殖民地标志着它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殖民制度的确立；1898 年美国在菲律宾建立了殖民统治，这是现代殖民统治的开始。从一开始，殖民者就是按照西方人的理解推行一种自由的商品经济，实行一种实际上是东西融合的管理制度，殖民权威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很少干预个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是一种建立在市场与自然经济导向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权威主义政治。然而，正如前述，这种权威主义是外来的，与被统治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在很多方面不能获得合法性，因而先天不足。这表现在，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社会和国家是分离

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延伸到社会的底层，社会处于一种自治的或失控的状态。例如华人社会几乎是由黑社会来控制的，而伊斯兰社区的自治性也很高，它们都不能参与“国家”政治。但无论如何，自这时起殖民者输入了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以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和控制。东西方文化从那时起就发生了冲突与融合。“现代性”由此而生，尽管那时还是非常孱弱的。

概括起来说，东亚的权威主义政治的形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文化原因。权威主义政治的形成与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不无关系。尽管西方殖民者在各国进行了至少一百年以上的统治，仍然不能改变那里的东方文化的底蕴。这或许是因为，在那大部分时间里，国家与社会、上层与下层是分离的，上层的文化很难形成对下层文化的有力冲击，尽管这种冲击确实存在；同时，华人移民大多数是在殖民统治的中后期涌入的，他们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时间并不长；而伊斯兰的土著居民有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很难被冲破。因而东方的传统政治文化仍然在社会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以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为例，其主要特征是皇权主义、清官思想、等级观念和集团意识。这些观念意识在华人社会中都有充分的反映。一位新加坡学者说，新加坡人传统的哲学是崇尚“仁慈的政府”认为政府应当是合乎道德的 取信于民的 就像家长对待子女一样。因此“仁慈的政府”就是家长式的政府。这是因为“家庭中的伦理纲常被转化成了政治伦理，对父母的孝敬转化为对君主的忠诚 而与兄长的关系则变成了公民关系。”理查德·所罗门也曾对这种情况进行过分析，他指出，在儿童成长阶段，新加坡人就接受了等级观念和集团意识的灌输。在华人社会中，每个人都避免冲突“一方面 他们渴望得到权威的保护 以避免相互倾轧和财富

被剥夺，这就使他们把一元的有绝对权威的政治领导看成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另一方面他们又畏惧这种严厉的权威 避免与‘猛虎’般的政府权威发生摩擦。”在这种政治心理中，大众往往认为政治是少数精英的事情，与己无关。这在另一方面就促进了少数精英的报国心理，导致了对政治的垄断。这种文化机制在殖民主义时期就表现的非常充分。

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在等级观念、权威意识方面与儒家文化有着基本的相同点（可参见“亚洲式民主”一章的政治文化部分）

当然，西方政治文化在五六十年来对东亚各国已经形成巨大的影响了，这些国家之所以在那一时期出现了多元政治的局面，有的国家一直有政治反对派、议会和大选存在，以及它们都实行了市场经济等，就是证明。但无论如何，在产生什么方式进行统治的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更为根深蒂固的东方传统文化。例如李光耀一直接受西方教育，曾经是一个真诚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社会公平，但是随着他在权力阶梯上的步步高升，其政治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先是改变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内涵，接着又重视儒家文化。这是由于他的主体性选择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与客观现实相一致。

经济原因。过去人们只知道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与专制主义和全权主义政治有着必然的联系，以为市场经济只是政治多元化的基础。虽然这个结论现在看来也并没有错，但显然是不全面的。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某些新兴国家中，市场化与权威主义政治的形成有着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在民族主义政权上台后，在推行市场化政策的初期，各国一般都面临着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迫使它不得不依赖外国公司的投资。为此，它就要给外国公司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提供免税等一些优惠政

策，这就造成了国家财政的紧张，不得不削减公共开支，放松物价控制 取削补贴 降低实际工资 这必然激起群众的不满。但是 要想不使跨国公司把资金抽走，就必须保证给他们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不罢工的工人。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除了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和控制之外，在政治上进行镇压也是不可缺少的。一句话，社会稳定需要权威主义政治的保证。因为那时还不存在树立起民主的权威的内在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主张自由民主的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东亚各国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治理并不感兴趣，它们既可以接受军事独裁政权，也可以接受民主政权，只要它们能保证自己的投资利益。反之，如果不能保证这个利益，它们就会干涉或反对。

在西方国家的市场化过程中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镇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不是依靠一支“无形的手”而是依赖一支“铁手”镇压成为再生产的主要工具。

当然，这些权威主义政府在推行有利于国际资本的经济政策时，也是十分谨慎的，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当国际资本铺天盖地的涌入时，国有资本也应运而生，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不致使本国成为外国资本的一统天下；同时它们的政府也深深地介入到了经济和社会管理之中，这就为自己的市场化提供了保护伞。

历史原因。西方现代的政治体制是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处处受到法的限制，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权力支配着政治权力。而新加坡的权威主义政治是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力必须凌驾于其他一切权力之上，因此，在取得政权之后，它有能力对付民权

运动的挑战。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不是在民族运动之时已经发育成熟，而是在民族独立之后依靠权威主义国家的扶持而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是权威主义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

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国的权威主义者上台执政和政局稳定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扩展就成为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首先，他们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军权对各种反对派力量进行打击，使自己独占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树立起执政党的绝对权威。例如，印尼的苏哈托把各类反对政党强行合并为两大政党，然后，实行控制，并以军人为核心扩大了自己的专业集团的统治基础；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利用国家安全力量最大的反对派“社会主义阵线”进行了打击，巩固了自己的统治；马来西亚以巫统为核心建立起了执政的国民阵线，这大大扩展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并对各种传媒进行了控制，实现了一党统治的稳定局面。泰国、菲律宾、韩国的军事管制更是权威主义的典型表现。一般来说，这些国家都通过建立由自己控制的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和全国性的各种形式的基层组织，把自己的政治权力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实行对全国的有效控制。这说明，在一定意义上，在某些方面，独立后的统治者可能同他们所取代的宗主国的头面人物一样远离人民大众。外来的宗主国权力一撤退，这个社会就被说成是独立的了。然而事实上，这个社会并未独立，只是社会中的某些人独立了。独立对社会的不同集团有着千差万别的影响。^①现代与传统的结合是促使这些领导层推行权威主义的内在因素之一。因此，我们应该着重指出

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第 473 页。

的是，东亚权威主义政治的建立与现代化的进程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三节 权威主义现代性的判定

判定权威主义的政治领导层是否具有现代性和具有多少现代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政治领导层是否以现代化为导向建立了高度制度化的政治体制来有效的贯彻领导层的现代化意图。无疑，东亚的权威主义领导层基本上都具备了这一点。一般来说，在这些权威主义者上台之后，都非常注重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至少在执政的一二十年内，马来西亚、新加坡则是在二三十年以上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在西方接受教育或受西方影响的领导人一旦牢牢掌握了政权，就立志推进现代化进程。与右倾的各民主党派相比，这些执政党更具有权威主义色彩，这一点或许更符合它们当时的国情；与‘左’倾各激进党相比 这些执政党更加务实 不像有的国家的执政党那样，坚持反殖主义的立场，而是强调生存危机。在此基础上，它得以建立起高度制度化的政治体制。

在这种体制中，政治家们对解决利益争端，对职位分配和制定政策，都有一致认同的严格程序。例如，职位的分配，可以通过选举、考试、正式推荐、根据业绩任命和试用等几种方式来实现。在新加坡，高级领导人的确定要经过六个选拔委员会的笔试、面试、心理测验、试用、参加竞选以致最高领导人的面试等各种法定的程序才能完成。这种选拔程序具有相当强的可操作性，而且，把候选人放到选区去与反对党候选人竞选，具有相当的公开性，可以进行比较准确的实绩评价。在新加坡任何人都很难通过这种程序以外

的途径进入政治体系。由于制度化水平高，这种政治体制可以同化各种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的领导人。当政治现代化进程把传统势力的领导人卷入国家政治体制后，随着他们在权力的阶梯上步步高升，不可避免的要将自己的忠诚从利益集团扩大到整个政治体制。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权威主义者也都建立起了制度化水平比较高的政治体制，使其政令比起过去的传统社会来畅通多了。有了高度制度化的体制，就可以提高行政效率，抑制腐败，尤其是可以强制性的有效的推行权威主义政治领导的现代化政策。

第二，政治领导层是否把经济发展放到首要位置。对于处于现代化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中心问题，是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尤其是在现代化的政治领导已经牢牢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当然这并不否定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更不能把经济发展当作抑制政治发展的手段，因为没有政治的推动，经济发展最终会受到阻碍。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在权威主义政治时期，只要经济发展能保持一定的速度，政府就能获得相当大的合法性；政府只有获得了合法性，才能实现政治和社会稳定，从而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相反，在那些经济不发展的国家，一方面孕育着政治和社会动乱的巨大的潜在因素，另一方面政治多元化成为反对派手中的有力武器。当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合法性只能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等到中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之后，它们必然会要求政治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经济发展受挫，权威主义政权很可能会迅速的瓦解。而且，没有一个国家会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不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甚至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持续高速增长能保持四十年以上。